



1946—1966

内蒙古民族贸易 90 年

林群烈

前　　言

我写《内蒙古民族贸易二十年》，是因为我曾经被调离已经工作过三十一年半的内蒙古自治区。

一九七七年六月一日，中共中央通知调我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参加领导工作，直接到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报到。六月十一日我乘坐由北京开往兰州的直达快车，赶赴银川。

六月上旬，在内蒙古正是温暖宜人的季节。我怀着依依惜别的深情，告别了首城。沿途我举目窗外，广阔富饶的土默川和黄河灌区河套平原，各种农作物郁郁葱葱；一群群牛羊，荡漾在绿色海洋似的牧场上；塞外钢城正在加速医治被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内外创伤，挺胸阔步向前进。这一切，都勾起了我无限留恋之情。火车飞速行进，眼看就要离别我曾经战斗和工作过三十一个半年头的内蒙古大地，离别朝夕相处的内蒙古各族人民。三十一个冬春和内蒙古各族人民共同战斗结下深情厚谊的经历，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着，我多么想和他们一起再战斗三十一个冬春啊！但往事已经随着岁月逝去，眼前的秀丽景色又使我感到惆怅而激动。由此，也兴出了我要把它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念头。

我初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工作的两年，需要集中精力了解自治区的历史和现状，需要熟悉干部情况，又忙于处理日常工作，谁能挤出时间动笔，只是挤点休息时间，在脑子里酝酿酝酿，

翻点资料，作些准备工作。直到一九七九年，才开始动笔，书名就叫《三十一年半》。

我把书稿送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审阅之后，出版社的同志建议我把书稿中的民族贸易部分抽出来，集中整理成书，我欣然同意。因为我到内蒙古工作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参与领导创建民族贸易，多年来，我已和它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它在我的《三十一年半》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内蒙古民族贸易二十年》是以我的亲身经历的体会为主，从总结经验的角度来写的。其目的是为从事民族贸易工作提供一些历史经验的参考，把民族贸易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本书重点是写的民族贸易，但不限于民族贸易。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五年期间，我既写了民族贸易，又写了全区商业工作问题。这样写，看起来似乎杂了一些，但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不这样写，就很难反映出当时民族贸易的全貌。但由于我接触实际和认识上的局限性，加上文化水平不高，难免有不全面或者是表达不确切的地方，诚心诚意地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在写《内蒙古民族贸易二十年》中，承蒙我的亲密助手潘琛毅同志帮助我在查阅和复印了二十年来我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傅元占同志帮助我查阅并复印了有关档案材料。还有肇和斯图、宝音巴特、米源盈、李占春、吴改之、王惠、吴荼林等同志，都热情地帮助我回忆，给我提供了有关资料。在这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我特向这些热心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致以诚挚的敬意！

林蔚然
一九八三年十月一日

目 录

前 言

一、社会主义商业诞生在内蒙古草原——在创办内蒙古实业公司的日子里	(1)
(一) 创办内蒙古实业公司是开展自治运动的组成部分	(1)
(二) 新课题	(3)
(三) 走访牧区，调查了解人民的需要	(4)
(四) 宝源、明安旗、贝子庙三个公司宣告营业，深受牧区人民的欢迎	(19)
(五) 调查碱、盐、口蘑、煤炭生产运销情况	(27)
(六) 多伦实业分公司	(33)
(七) 内蒙古实业公司完成了历史任务	(36)
(八) 深切怀念两位老战友	(40)
二、西蒙贸易公司的始末	(44)
(一) 西蒙贸易公司的成立与演变	(44)
(二) 西蒙贸易公司内部职能机构设置与人员情况	(46)
(三) 组织商品流通	(46)
(四) 对于旅蒙私营商业的利用和改造	(55)

三、内蒙古贸易总公司诞生在乌兰浩特.....	(59)
(一) 贸易总公司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	
.....	(60)
(二) 在改革中前进.....	(65)
四、“大跃进”带来了大困难.....	(71)
(一) 布署商业工作要为“大跃进”服务.....	(72)
(二) 发生的问题及其原因.....	(77)
五、认真执行调整方针，克服困难胜利前进.....	
.....	(87)
(一) 合理分配和供应商品.....	(90)
(二) 调整农牧产品收购政策，协助生产部门发展 生产，提高商品率，扩大商品货源.....	(93)
(三) 加强民族贸易工作.....	(106)
(四) 加强服务行业，发展修理业务，便利人民生活	(112)
(五) 恢复与开展农村集市贸易.....	(114)
(六) 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商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118)
(七) 商业企业中的党组织要做好党的经常工作...	
.....	(124)
六、总结经验，不断前进.....	(131)
(一) 民族贸易是一项具有特定内容、特殊意义、 特殊作用的非常重要的事业.....	(131)
(二) 从实际出发，制定必要的特殊政策，是做好 民族贸易的重要条件之一.....	(133)
(三) 要建立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民族贸易 队伍.....	(134)
(四) 要充分重视发挥民族贸易机构的作用.....	(135)

(五) 在民族贸易工作中要注意正确地体现党的民 族政策.....	(137)
(六) 在牧区经营牲畜要正确处理国家利益与牧民 利益的关系.....	(139)
(七) 在商品供应上要正确处理一般与特殊之间的 关系.....	(143)
(八) 在组织货源上要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依靠外 援的关系.....	(145)
(九) 在经营方式上要正确处理好建立固定网点与 流动经营的关系.....	(147)

一、社会主义商业诞生在内蒙古 草原——在创办内蒙古 实业公司的日子里

(一) 创办内蒙古实业公司是开展 自治运动的组成部分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八年的英勇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张家口宣告成立。随之，在察哈尔盟、锡林郭勒盟及其所属各旗，先后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分会和支会，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讲解内蒙古人民应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能得到真正解放的道理。刚从日本帝国主义和它豢养的德穆楚克栋鲁布的伪蒙疆自治政府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欢欣鼓舞，异口同声称颂“共产党、八路军真是我们内蒙古人民的救命恩人”。同时，也普遍反映出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剥削下，内蒙古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非常贫困，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十分缺乏，又经过战争，旧的商业渠道已中断，新的商业渠道还没有来得及开辟，在内蒙古广大地区，特别是广阔的牧区，商品流通中止了，广大人民急需的日常生活必需品，

粮食、副食和牧业生产资料无处买，急需要出卖的牲畜、皮、毛等产品，没有人收购，严重地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和生产，迫切要求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帮助解决。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内蒙古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提出的《目前工作方针》中的第三条规定：“应当确定为人民谋福利的经济政策”，“在贸易上，基本上应当是公平交易，互利互惠，并以有利于蒙民生计为原则”。并决定成立内蒙古实业公司，首先担负起广大牧区的商品流通任务，尽快地大量地以合理的价格组织供应人民群众所急需的商品，收购牧民急于出卖的牲畜、皮、毛及其他产品；再逐步组织开发内蒙古地区的丰富资源。把商业工作作为开展自治运动的“先行”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

在创办内蒙古实业公司一开头，就碰到了两大难题，一是缺资金，二是缺干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刚刚成立，还没有来得及筹集必需的财政资金，干部也很少；而在察哈尔和锡林郭勒盟的自治运动开展又很快，盟和旗都需要一定数量的干部，也需要必要的经费开支。面对这种现实情况，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下决心，积极想办法，帮助解决。第一条办法是，除紧缩机关开支，挤出一部分钱作为创办内蒙古实业公司的资金外，就是责成实业公司，动员社会资金，采取入股分红办法，把实业公司办成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章程和集股分红办法一公布，立即得到社会上广泛响应，许多人争先向公司入股，在短短的两个来月中，就筹集到了公司当时所需要的资金。第二条办法是，除报经中央批准从中央派赴东北的干部中截留了二十多名从延安出来的做过财贸工作的老干部，作为骨干，从蒙族中选调几个过去做过财贸工作的和愿意从事民族贸易工作的青年学生外，主要是招收了具有蒙语会话和商业技术知识的人员。并规定凡在公司及其所属单位工作的职工一律实行工资制，每年根据其成绩的大小，年

终给予适当的奖励。招收职员的广告一贴出去，报考的人员非常踊跃，经过严格考试，择优录取，顺利地解决了当时公司的人员缺乏问题。

两个难题解决了，大大加快了创办实业公司的步伐。

（二）新课题

我本来是随中央派赴东北的干部大队，去东北开辟工作的。但是，走到张家口，由于国民党的阻挠破坏，去东北的交通线被阻。中共中央决定，这一批干部就在张家口分配工作。当时，乌兰夫同志正在张家口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察哈尔和锡林郭勒盟开展自治运动，急需大量干部，特别急需一批商业工作干部，要求中央给予调配，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分配到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参加刚刚开始筹办的内蒙古实业公司的创办工作。这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新课题。我虽曾在陕甘宁边区做过一年贸易工作，但却从来没有做过民族贸易工作，也没有接触过民族工作。过去对于蒙古民族一点也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知道的也很少。面对这个新的情况怎么办呢？我考虑唯一的办法就是担起担子，结合工作，认真学习。当时为了完成党交给的这项新任务，我主要采取了两条办法，第一条是学习；第二条是调查研究，实际上调查研究是更重要的学习。

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从哪里下手呢？当时由于忙于筹建机构、招收职工、组织进货……，没有时间有计划地学习，基本上是碰到什么学什么，急需什么学什么。

首先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主要是靠自己结合工作和调查研究，挤出点时间安排学习，没有突击，也没有间断。多年来养成了一种习惯，不管是在党政军民商

学哪一个工作岗位上，无论是做哪一项工作，总要联系党的民族政策认真考虑一下，怎样才能有利于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这是我在内蒙古自治区工作中的重要收获之一。

（三）走访牧区，调查了解人民的需要

从一九四六年一月份开始，内蒙古实业总公司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筹备工作——调入干部，组建内部机构（秘书室、研究室、营业部），招考职员，拟定章程制度，购进牧区人民生活的必需商品重点是蒙古民族的特需商品等。为了掌握比较充裕的蒙古民族特需商品的货源，除了充分利用与发挥张家口、多伦、张北、宝昌等城镇已经形成的生产蒙古靴、马靴、马鞍具、毡疙瘩（毡靴）、毡子、皮衣、茶具、炊具、勒勒车、小的牧业生产工具、蒙古刀以及点心、挂面等生产厂子和手工业工人的生产加工能力，有计划地大量加工这些商品外，还通过关系和生产砖茶、生茶、绸缎等产地的厂商挂钩，建立起比较稳定的供货关系。掌握了比较可靠的货源，这就为我们实业公司深入牧区，大力开展民族贸易准备了较为雄厚的物资基础。

到三月中旬，已基本筹备就绪。按照每个分公司给配备二至三名老干部作为分公司的领导骨干，绝大多数的工作岗位都是分配新招收的职员负责。先组成了察哈尔盟的宝源（后改为宝昌）、明安旗、锡林郭勒盟的贝子庙（后改名锡林浩特）三个分公司以及拟派出的锡林郭勒盟所属各旗的流动经营购销业务的经理组和账房，分配了各分公司的商品和干部职工的生活用品。公司决定由关起义（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行委员兼实业公司副经理、蒙古族）、瑞永（公司研究室副主任，达斡尔族）和我（公司秘书室主任兼人事科长）负责，带领这三个分公司及其所属经理组

和帐房的全体干部职工和商品，去察哈尔盟、锡林郭勒盟建立分公司机构，开展民族贸易工作；同时，我们用了大部分时间，深入到牧区人民当中，调查了解人民的经济生活状况，摸清楚他们急需要买什么，卖什么，还有哪些迫切需要和要求，以及牧区可以开发的资源情况，以作为我们实业公司今后扩大经营的参考。我们三人愉快地接受了任务，雇了十多辆胶轮大车，装好了三个分公司的货物，我们几十个人，随车于三月中旬从张家口出发，奔向察哈盟和锡林郭勒盟了。

1、牧区和靠近牧区小城镇的市场物价情况

宝源（宝昌）

我们四月一日到了宝源，经过对市面的观察和访问，座谈，了解到许多商人对我们党的工商业政策还不很了解，甚至还有怀疑、误解，有些商店暂时关门，在自己店门外摆设货摊，搞点试探性营业，待机进退；也有的商店暂时关门，坐等观望，待机而动；特别是金融，三个月来经过几次大的波动，更加重了商人的顾虑。据了解，从一月份以来，晋察冀边区币（以下简称边币）与伪蒙疆币（以下简称伪蒙币）的比价已经出现了三次大的波动。一月份，军事调处执行组到达张家口，有些国民党特务在群众中造谣说：“八路军整编了，共产党不顶事了，国民党来了伪蒙币就吃香了，可以一元顶一元。”在这里应当附带说明：军事调处执行组，是由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出各地的由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美国各一人组成，监督实行停战协定。军事调处执行部，是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中共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中规定：为实行停战协定，应立即在北平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执行部由委员三人组成，一人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因此，许多人都保存着伪蒙币不放，当时规定边币与伪蒙币比价是

一比五，而黑市却变成一比三，甚至一比一的也有。到二月末，县政府一面召开会议宣传解释，一面张贴布告晓喻群众，边币与伪蒙币的比价才慢慢恢复了规定的比值。三月中旬，宝源商人去张家口进货，使用伪蒙币不如使用边币好进货，就误认为伪蒙币不顶事了。回来后，都想把伪蒙币抛出去购进些商品较为保险，仅几天工夫，边币与伪蒙币就由一比五变为一比七八了。本来市场上的商品就很不足，再加上商人惜售和竞相抢购，商品更显得缺乏，物价直线上涨，人心恐慌，严重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

到四月六日，市场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惜售商品情况明显好转，物价出现稳跌，如每匹三丈二尺的白土布批发价由伪蒙币二万元，跌到一万六七千元。这个新变化主要是由于近几天来，由张家口、张北运来土布约千匹左右，还运来一些日用杂货；特别是我们三个分公司十多辆大胶车的商品，浩浩荡荡同时运到了宝源，对于这里的商人刺激比较大，他们害怕公司把大批商品抛到市场上，压低了物价，影响他们赚更多的钱。因此，商人们就改变了惜售和少卖多买为争取多卖早卖，市场开始出现暂时缓和。

原来专跑牧区作买卖的商人，绝大多数都在观望等待，不肯“冒险”行动。只有很少商人用勒勒车拉着少量商品，到牧区边沿，做一点试探性的买卖。

贝子庙（锡林浩特）

四月二十五日，我们到了锡林郭勒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贝子庙，第二天，便对贝子庙市场情况专门进行了调查了解。自从去年八月打跑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以来，除热河省景峰的小商贩运来过一部分白酒、点心和挂面外，其他商品都没有人运进来，所以这里实际上既没有商店、摊贩，又没有商品交换，只有一个铁匠炉，从去年八月因战争停业以来，还没有恢复营业。

土牧尔台

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从苏尼特右旗的比鲁特苏木由老喇嘛赶了两辆牛车送我们去土牧尔台，全程一百来里路，坐牛车一天走不到，中间没有人家，无处住宿，只得拉着水和锅以及吃的東西，准备在路上露宿一夜。一直走到晚上十点来钟，就在草堆上住下了，我们都动手拣干牛粪，挖灶支锅，点火做饭，饱餐一顿，躺在草地上，天作被地当床和衣而睡，虽然西北风刮个不停，到了下半夜真冷，但由于劳累，一躺下去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天大亮，好象从来没有睡过这样香甜的好觉。

睡醒了，起来拍打了衣服上的土尘，放牛的放牛，烧茶的烧茶，喝了茶，我们就套车赶路，中午到了土牧尔台。午饭后，我们就去商会访问，了解土牧尔台市场物价情况。商会王先生告诉我们，商会现有七个委员，实际上也没有多少事情办，这里的商业大多是跑草地（牧区）作买卖的，所以生意的好坏不决定于本市市面，而决定于牧区，就拿白酒来说吧，就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运销到牧区了。这里的商业主要是经营米面、酒、油、生菸、砖茶、点心，还有布匹、杂货等，一般都是一揽子综合商店，比较大的有钱合成、德森泉等十多家，他们经营的工业品都是从集宁、商都、张家口批发来的。据了解，当时（五月二十二日左右）的市场物价（伪蒙币）是：三二色土布（幅宽一尺一寸）每匹一万三千元，驼毛每斤二千元，套毛每斤五至六百元，抓毛每斤七八百元，老羊皮每张四五千元，好牛皮每斤五六百元，胡麻油每斤五百四十元，辣椒每斤八百元，小米每斗二千元，麦子每斗一千二百元，白面每斤八十元，白酒每斤四百八十元至六百元，食盐每斤六十至八十元。现在只有很少商人，试探着带着少量的米面、白酒、砖茶、生菸等到牧区换点皮毛、活羊等。谈了话，我们从商会出来，走遍了所有的商店和货摊，给我们的印象是：市场很不景气。

2、牧区人民衣、食、住、行、用困 难重重，迫切要求商品流通

我和关起义、瑞永等三人，于四月十四日在明安旗与贝子庙分公司的人员分手，约定到乌尔图塔拉再会合一路同行。我们乘勒勒车（一条牛拉的木车），分路北行，开始对牧区人民生活进行实地考察了解。

我们三人，从四月十四日开始进入牧区实地考察，到五月二十二日走出牧区，在一个多月里，我们乘车（勒勒车）、骑马、骑骆驼，重点地走访了许多牧民家庭，也走访了一些王公贵族和喇嘛，形成了一个总的印象是：蒙古民族特别是广大牧民，长期以来，由于反动统治的压迫剥削，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贪得无厌的残酷压榨掠夺，牧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贫困，衣食住行用，困难重重，贫病交加，目不忍睹。仅就我亲眼所见，亲口访问，所得的具体材料选录如下：

（1）无布无线穿衣难

四月十四日，从明安旗乘坐勒勒车北行，这一天曾到三户牧民家里访问。这三家都有成群的牛羊，也有一些马，应该算是比较富裕的人家。但是无论男女老少，衣服穿着都很破旧，一般都是缺衣少穿，有的更是无衣可穿。我曾亲眼看到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子，她除穿了一件破烂上衣外，下身竟无一丝一线。我们看到这种现象非常难过，她的母亲长叹一口气说：“唉！孩子受冻我心疼，有钱也买不到布，没有法子呀！”

四月十六日，由郝巴尔罕苏木乘坐勒勒车，走了大约十五华里左右，到了正兰旗六佐大静格的一户牧民家里吃早点，这家的女主人身上穿的是皮衣皮裤，而下面却光着脚穿了一双破单鞋，看起来极不相称。但是买不到布，换不了季，也买不到靴子穿。商品流通渠道不通，给牧区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早点后，换了车继续向前走，大约走了十五六华里，到了混同好来（仍属正兰旗六佐），当我们走进一家蒙古包里访问的时候，看到这家主妇穿了一件比较新的单长袍，使我马上感觉到这一家可能不是缺衣少穿的了。恰巧在这个时候，她在两件小事上打消了我的那一刹那的错觉。第一件小事，是在她洗脸的时候，从木柜里拿出来一个很小的木匣子，轻轻地打开，取出一块又破又脏已经很难辨认出它是什么颜色的布片，绝大部分都已变成了这条线不连那条线的程度，全幅也找不出一方寸不破的地方，这就是她唯一的一块洗脸巾。擦完了脸和手，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木匣子里，送进柜子中。第二件小事是，她洗完脸，又拿出一条大约二指多宽的白布条，很用心地去拆掉那上边的一条一条白线，把拆下来的线，两条并在一起，用双手搓捻起来，当作缝衣服用线，这真是没有办法（买不到线）中的唯一办法了。从这两件小事中活生生地告诉我们，牧区人民群众缺布无线已经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程度了。

四月十九日，我们在乌尔图塔拉向两位老盐商了解大青盐过去的运销情况时，顺便问他们这里是不是缺棉线、线麻。他俩告诉我们说，棉线很缺，线麻也没有，但线麻销路不大。因为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禁止买卖线麻，牧民们没有办法了，就试用榆树皮纳鞋底缝鞋子。试用结果，它的耐用程度不比线麻低，这几年来，很多人都拿榆树皮代替了线麻。我听了很受感动，使我认识到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是会战胜重重困难的。

四月十六日，当我们走到谢力特老准备换车，被主人迎进蒙古包里坐下来休息喝茶的时候，瑞永用蒙语向这家两位老牧民说，我们是内蒙古实业公司，是咱们蒙古人民的买卖，专门经营内蒙古人民所需要的吃、穿、用的必需品，收买人民需要出卖的牲畜、皮毛等产品。凡是你们需要买的或卖的东西，我们公司都给办。老俩口听着喜笑颜开，异口同声地说：“谢天谢地，这样以后

的日子就好过了。”老汉接着向我们诉说遭受日本侵略者统治的苦难。他说：“我们这里有好几年了都买不到布匹，生活必需的用品也很难买到。”说着，顺手扯起老婆婆穿着的皮裤说：

“冷天毛朝里穿，热天毛朝外穿，春夏秋冬就是这条皮裤。打走了日本侵略军，你们要是不来作买卖，我们就是有点皮毛和牛羊，也还是换不来布匹和日用品，穿不上衣服啊！我的腰带也是对付着用呢，没有法子呀！”说着，顺手解下已经破烂得不象样子的一条本来是用作洗刷锅碗的稀粗布的所谓腰带，叫我们看。听着老人的控诉，眼看着这种缺衣少穿的困苦情景，我们三个人的心里都好象压上了一块大石头，觉得十分沉重。老人长叹一口气接下去说：“困难了多年总算过去了，咱们内蒙古公司要来作买卖，就不用再发愁了。”瑞永问他：“你们现在急需要些什么商品呢？”他毫不思索开口便说：“洋布、土布、什么布都需要，火柴、生菜、砖茶、线都急用啊，就是没有地方买呀！盼望你们早点把商品运来吧。”

五月三日，我和关起义、瑞永离开贝子庙西行，继续走访牧区。从贝子庙西行不到十华里，看到了两顶非常破旧的蒙古包。从外表看很象是贫苦牧民，我们特意走进去看看。这两个蒙古包是两户，每户都是只有一个六十来岁的孤寡老太太，他俩都是除了穿着一件破烂长袍外，下身连裤子都没有。包里的家俱既少又破旧，经济生活十分贫困。有个老太太本来有一个儿子，在贝子庙当喇嘛，去年病死了，即便儿子还在当着喇嘛，也不能赡养老人，生活照样贫困。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三人商议，怎么解决这一类贫苦牧民的穿衣问题呢？关起义同志提出要发起募集旧衣，由我们公司负责免费运来牧区，分发给这类贫困户，以解决他们无衣可穿的困难。因为就是有大量的商品布匹运进来自由买卖，这一部分人也是没有力量购买的，应该用救济的办法来解决。

(2) 三分之一牧民没有粮食吃

自治运动刚一深入到牧民中去，首先碰到一个急待解决的大问题是约占牧区人口三分之一左右的贫苦牧民已无粮可吃，完全依靠少量的奶食维持生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下定决心，迅速拨粮救济。

五月九日，我们到了西阿巴哈那尔旗，专门对发放救济粮的情况进行了访问了解。

当时，这个旗公署已经组织牛车把分给他们的救济面粉从康保县运回来了，据旗长那其格说，因为没有得到盟公署分配救济面粉办法的具体指示，已经等了几天，也商议了分配办法，还没有敢分配。关起义同志当即指出：这部分救济面粉，应该根据真实的需要情况，尽快地合理分配下去，分配到急需要救济的牧民手里，不能平均分配，也不能再这样等待下去了，去运面粉的人和牛车，可按半义务半付报酬的原则处理。旗长根据这一原则精神，找有关人员很快地商定了具体分配方案是：这次分配给这个旗的救济面粉共两万斤，全旗人口总数是二千三百人，以每户平均只有五头大牲畜（五隻羊折顶一头大牲畜）以下的应该给予救济为标准，应得到救济的共六百八十二人。除去运输面粉的开支即：参加运输的牛七十头，勒勒车七十辆，来往两个月，每头牛（包括车）付给面粉五十斤，共计三千五百斤；死牛一头，丢失牛一头，每头给面粉一百斤，共计二百斤；路上扔掉破车二辆，每辆给面粉五斤，共十斤；赶车的人每人给面粉五十斤，赶车人和请康保县武装三十人护送一路吃喝开支，以及消耗的车油一百四十斤等项费用，除一部分由旗里公费开支外，另一部分需要用面粉开支；以上各项开支，共需支付面粉八千斤。真正可用于救济的面粉共一万二千斤，按应救济的人口每人十五斤分配，共计分配一万零二百三十斤，尚余一千六百八十斤，作为机动，由旗公署掌握，解决临时急需。这样分配结果，得到救济的人口可以占到